

HARBORING THE PAST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AS CROSSROADS OF TRADE, ART, AND CULTURAL MIGRATION

抵

海洋東南亞的
文化交會

岸



候風之港，連海之帆——

「抵岸：海洋東南亞的文化交會」特展單元 I 概介

■ 林宛萱、林容伊

「海洋東南亞」位處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會地帶，涵蓋東南亞廣袤的島嶼及馬來半島的南端。「海」是此域的交通要路，星羅棋布的島群、綿延的海岸線與大小海峽，共同構成航行路徑與中繼節點。各地港口及其腹地不僅提供補給及物資流通，更是歷來文化互動與政治角力的樞紐。隨著季風循環，「風」引領來自印度、中國、阿拉伯乃至歐洲等外來群體，他們熙來攘往，推動更為龐大的貿易網絡與歷史變遷。各方文化與信仰雖如潮汐般往返起落，卻在本土社群的吸納與再造中沉澱，凝塑出此域流動開放、兼容並蓄的海洋性格。本次特展有別於過往聚焦東亞與歐洲文化互動的論述，而是將視角轉向東南亞島群——這個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節點，如何孕育出獨具風貌的在地文化。本次特展之展期從 2025 年 10 月 4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4 日止。¹

「海洋東南亞」(Maritime Southeast Asia)一詞與「大陸東南亞」(Mainland Southeast Asia)相對應,指的是以島嶼與海洋為主要地理特徵的區域,其範圍大致涵蓋今日的印度尼西亞、汶萊、東帝汶、馬來西亞、新加坡與菲律賓等國。南島語族是此區域最主要的居民,自古長於航海,便於島際之間的資源交換,故而島嶼沿岸擁有諸多歷史上著名的自由港口。由於地理環境分散,歷來少有長期統一的龐大政權,卻持續受到印度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以及後來歐洲文化的深刻影響。其族群、歷史、語言乃至政權,如同繁星般錯綜而幽深。然而,正是這種開放與包容的特質,使海洋東南亞成為各方文化融會之所。海的開闊與港的包容,是構成本次展覽的策展意象。以「抵岸」為題,則寓含歷史上文化「移動」與「抵達」的雙重意涵——既是他者旅途的見聞,亦是歸人故里的舊景,文化正是在無數次的抵岸與擇取之間,不斷積澱,形塑出今日的樣貌。²

此次展覽集結本院及國內外多家博物館的珍貴典藏,包含荷蘭公主堂陶瓷博物館(Keramiekmuseum Prinsessehof)、馬來西亞青

雲亭(Cheng Hoon Teng Temple)、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等十家國內外文化館所的慷慨借展,計展出一百六十八組件文物。透過這些作品,觀眾得以窺見海洋東南亞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風華景象。

展場入口通廊設置錄像,以一望無際的海洋為引,象徵百年前旅人通往海洋東南亞的唯一途徑——「海」。穿過大海,觀眾將踏上一段追索過往的航程(圖1)。到訪者可循前人遺留的文物,如仰望星圖般尋路,串聯三個航點:「候風之港,連海之帆」、「豐饒之島,靈性之器」以及「競逐之海岸,並立之文明」。旅程伊始,觀者將從他者的視角出發,探索十九世紀以前東亞與歐洲人對海洋東南亞的凝視,揭示其遠渡重洋的多重動機;隨後,視線轉向在地,抵達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觀察海洋如何攜帶物質文化深入內陸,並融入原住民社群的儀式與生活;最終,航程來到馬六甲海峽與爪哇海諸島之間,在此,跨族群與跨文化的交流與競逐交織出多層次的文化景觀,展現海洋東南亞多元並立的文明樣貌。本文將聚焦在第一段航程,簡述此域在亞歐海洋貿易歷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透過多樣的物質證據,不僅傳達其「豐富紛呈、變動不息」的基調,同時反映在地人群獨特的好尚、文化融合與發展。

候風之港,連海之帆

一、海洋與跨域的人群

十五世紀末,胡椒的辛辣與丁香的馥郁,因高昂的轉口價格而成為驅動力,吸引西歐人相繼冒險踏上未知的水路,直抵盛產香料的「東



圖1 特展展廳入口意象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瑀攝

印度」，開啓全球貿易的新篇章。

然而，這片被歐洲人視為「新發現」的海域，早已是亞洲在地商人往來數百年的熟悉航道。在一五一一年葡萄牙人初抵馬六甲以前，來自印度洋的穆斯林商人，以及中國、琉球與日本的船隊早已巡梭於海洋東南亞的島嶼之間，在地的爪哇、馬來、布吉（Bugis）商人更長期活躍於此海域。不同形制之船隻往來頻繁，各國僧侶與使節亦絡繹不絕。

在蒸汽動力尚未出現之前，季風是跨越大洋的唯一依憑。亞洲海域自古透過港口緊密串連，不同族裔與信仰的商人，以海域或港口分隔成不同貿易圈，透過自由港的層層交換轉易，得以將貨物自亞丁灣一路轉運至日本海，構築

出連結東西方的龐大貿易網絡。隨著人與物的流動，印度教、佛教與伊斯蘭信仰亦在海洋東南亞的諸多港口王國中擴展。

展覽一開始，展出著名的〈摩鹿加群島圖〉（*Insulae Moluccae*，圖2），並搭配「季風地圖」及「香料聞香體驗區」（圖3），帶領觀眾回到大航海時代。觀者或可在聞香體驗的同時，遙想這些植物如何驅動跨洋冒險。

此圖由荷蘭製圖師依據葡萄牙的航海圖於十六世紀末修繪，此次展出為一六一七年刊行的版本，反映出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人們對「海洋東南亞」地理知識的進展。雖然各島嶼輪廓尚不精確，但其相對位置已大致正確。摩鹿加群島（今稱馬魯古群島）當時以香料聞



圖2 1617年刊行 普朗修斯 摩鹿加香料群島圖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18.021.0012



圖3 展廳「季風地圖」及「香料聞香體驗區」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瑛攝

名於世，並銷往世界。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島群中的幾座火山島仍是全球唯一的肉豆蔻與丁香產地。此圖右上角的拉丁文榜題述及特爾納特島（Ternate）與蒂多雷島（Tidore）盛產丁香，帝汶島有各類檀香，以及班達群島生產肉豆蔻。地圖下方細緻描繪這些難以替代的植物形象：肉豆蔻、肉豆蔻皮（假種皮 mace）、丁香花苞、黃檀香、紅檀香與白檀香，具象化了強大的商業吸引力，也象徵歐洲人對「東方」的想像與慾望。

地圖測繪與航海技術隨著歐洲海貿擴張不斷精進。十五世紀末以降，歐洲的地圖與航海紀錄中，「東印度」或「香料群島」之名反覆出現，成為財富與新航路的代名詞。一六〇〇年製圖的〈東印度圖〉（圖4）特別以黃色標出印度次大陸與馬來半島兩大南伸的海岬，顯

示其作為通往香料產地的必經航道。地名標示亦在此區最為密集，正是歐洲人關注的東方貿易航線。而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2）的〈亞洲圖〉（圖5）採圓錐投影法，標示經緯線、赤道與北回歸線，將印度置於中央，突顯自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至馬六甲海峽、南洋水域，再通往中國、朝鮮、日本的航線網絡。地圖雖與現代亞洲分布接近，但內陸資訊與海岸線仍不精確。特別以紅色標示爪哇、香料群島與日本，顯示其為荷蘭重點經營的商業據點；大陸東南亞的外海以黑點標示危險水域，提醒航行注意，反映此圖與荷蘭貿易的密切關聯。這些圖像既是地理知識的產物，也是權力與商業的工具，反映出香料貿易如何形塑歐洲的地理認知。³



圖4 1600年製圖、1608年出版 馬提亞斯·夸德（Matthis Quad, 1557-1613）東印度圖 飯塚一教授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圖 000011



圖5 1607年刊行 洪第烏斯 亞洲圖 飯塚一教授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號 000001



圖6 明 馬歡撰 《瀛涯勝覽》 明萬曆四十五年江西巡按陳于廷《紀錄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號 002606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瑪攝

當歐洲製圖師繪製「東印度」時，海洋東南亞已逐步轉向伊斯蘭化階段。海洋東南亞的早期歷史，粗略可分為十五世紀以前受印度文化影響的時期，以及十三世紀後逐漸伊斯蘭化的階段。

伊斯蘭教隨著印度洋的阿拉伯及印度穆斯林商人，逐漸流布在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如重要史料《瀛涯勝覽》（1451），詳記馬歡（明代穆斯林翻譯官，精通阿拉伯語）於永樂至宣德年間三度（1413、1421、1431）隨鄭和（1371-1433）出使西洋航海所見。書中描述「滿刺加國」（馬六甲蘇丹國）：「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圖6）。馬六甲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由室利佛



圖7 中爪哇時期或後夏連特拉時期（10世紀）佛坐像 彭楫棟先生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銅 000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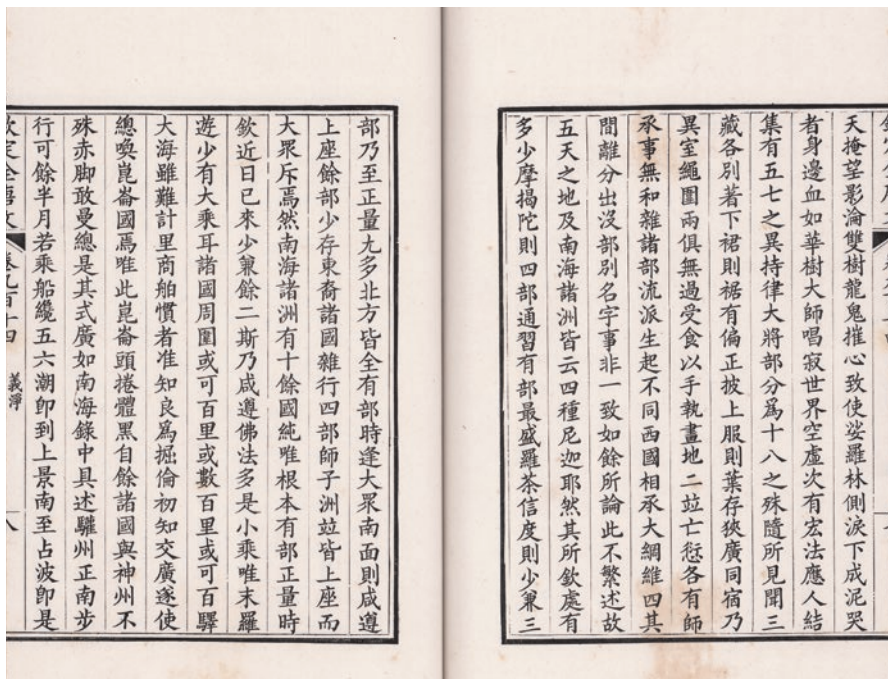


圖8 唐 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 收錄於《欽定全唐文》 清嘉慶二十一年揚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2217

逝巨港城（Palembang, Srivijaya）王子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建立，藉與明朝結盟以抗衡暹羅，而後發展為海洋東南亞最重要的貿易港口之一。伊斯蘭化使馬六甲最初作為跨洋穆斯林網絡的樞紐，也象徵東南亞由印度化王權向伊斯蘭海洋秩序的轉型。

在此之前，印度文化曾深刻浸透這片海域。爪哇島在十六世紀初改奉伊斯蘭教以前，曾出現多個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佛教王國。其中，位於爪哇中部、建於八至九世紀夏連特王朝（Śailendra）的婆羅浮屠（Borobudur）佛寺，為此一文化融合的代表性遺構。院藏約十世紀的爪哇釋迦牟尼佛造像（圖7），即可視為其稍晚的藝術風格的體現。佛陀垂足倚坐於寶座之上，雙手結說法印；底座中央飾有法輪，兩側

對稱的跪鹿，象徵初轉法輪之義；方背寶座兩端分別設有踞於象背之上的獅面馬身神獸；佛身背後配以火焰紋圓形頭光與傘蓋。其造型與裝飾風格，融合了爪哇及東印度帕拉王朝那爛陀（Nalanda）地區的造像傳統，顯示印度藝術樣式在爪哇的深層影響與在地轉化。

早幾個世紀，唐代高僧義淨（635-713）在七世紀下半，取道南海前往印度求法，目的地即為印度東北的那爛陀寺。那爛陀寺當時四方學僧雲集，是世界最重要的佛教學術中心之一。途中，義淨多次停留於室利佛逝國（今蘇門答臘），學習梵文並從事經典翻譯。他的著作《南海寄歸內法傳》詳細記錄東南亞與南亞的見聞，指出南海諸國多信奉小乘佛教，末羅遊國（今蘇門答臘占碑地區）仍見大乘佛法的傳承（圖8），

見證當時佛教流布情形。

十五世紀，印度洋與南海貿易的重要穆斯林港市包含古吉拉特、古里、亞齊、馬六甲等地。十五世紀初，隨鄭和出使的翻譯官費信於《星槎勝覽》〈古里國〉一章記述了古里（Calicut）的繁盛景象。古里位於印度西南岸，為天然良港，正處於鄭和船隊自馬六甲海峽出發、穿越印度洋、最遠抵達非洲東岸的關鍵航路上。該地商賈多為穆斯林，鄭和船隊七度停留於此。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亦曾在此登陸，費信稱之為「西洋諸國的馬頭」（圖9），可見其地位之重要。作為十五世紀的國際商貿樞紐，古里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與商人。海洋東南亞出產的珍貴香料從摩鹿加等產地，可能循著航線運至望加錫與馬六甲，

再轉口至古里，進而銷往阿拉伯、波斯乃至歐洲等更遙遠的地區。古里在當時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橋樑，在當時全球商業網絡中占據關鍵地位。

明朝官方寶船的西行與購買力，使胡椒逐漸從印度西南岸移種至更接近市場的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而威尼斯商人的香料壟斷，則激發葡萄牙與西班牙踏出了中世紀，追尋香料東來，開啓海洋東南亞的大貿易時代。追逐丁香、肉豆蔻與胡椒等夢幻逸品遠航而至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與英國人將之作爲殖民的口岸。他們以武力及壟斷迅速打破既有的貿易秩序，使港口因香料而繁榮，亦因爭奪而動盪，並在諸多島嶼歷史上留下血腥斑斑的印記。



圖9 明 費信撰 《星槎勝覽》 收錄於《古今說海》 明嘉靖甲辰（23年）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775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瑀攝



圖 10 明 張燮撰《東西洋考》 明萬曆戊午（46 年）王起宗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9048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瑀攝
張燮所著《東西洋考》，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成書，受漳州地方官員委託編纂。當時月港是明代重要對外貿易口岸，書中詳載前往東南亞的航路與針路，可作為貿易指南。書中有「東西二洋」之稱，並記「文萊國，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反映明代中國對海外的地理認識。東洋包括日本、琉球、呂宋、蘇祿諸島等，其餘東南亞大陸與群島、南亞乃至天方則屬西洋。

歷來涉足於此的不同文明，在典籍中對海洋東南亞的稱謂各異。對十四世紀的爪哇滿者伯夷而言，此地為「努山塔拉」（Nusantara，意為島際）；明代中國典籍稱之為「東西洋」，清代則稱「南洋」，視為香料與珍奇之地。如張燮（1573-1640）《東西洋考》（1617）詳載明代航路與針路（圖 10），反映中國對海外的地理認識。歐洲自十五世紀末起則以「東印度」與「香料群島」命名之，視其為財富與新航路的目標。

在不同命名之間，「海洋東南亞」成為多重視野交會的節點——既是地理實體，也是文明與權力競逐的空間。季風連結了人群、香料驅

動了航行，而在這片海域交織的不僅是貿易網絡，更是多元信仰、文化認同與殖民記憶的複雜歷史。

二、海洋與流動的物質

海洋東南亞憑藉豐富的林礦資源與眾多港口，長期在亞洲乃至全球貿易網絡中扮演關鍵角色。除了香料之外，十九世紀後，錫、橡膠、糖、菸草成為新興大宗商品。這些港口或有更替，然皆承擔國際商品的轉運中心，連結起東亞海域、印度洋與歐美的複雜貿易網絡。

展覽透過物質文化視角，藉由沉船出水、考古出土與傳世遺留的織物、銅器、陶瓷等物證，結合歷史文獻，使我們得以「觀看」海洋



圖 11 上：18 世紀晚期至 19 世紀初期 印度西北部 絲織雙向伊卡（帕托拉）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039
下：17 世紀至 18 世紀 印度西北部 印花儀式用棉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65



圖 12 17 世紀晚期至 18 世紀初 印度西北部 印花棉布（儀式用掛飾）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織 000136

東南亞曾經的貿易網絡的運作機制。這些物件不僅見證了商品流通的路徑，更反映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偏好，以及跨文化交流中的適應與轉化。

（一）織品：柔軟的跨文化載體

早期前往南亞與東南亞的旅行者，包括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的遊記、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的《東方誌》（*Suma Oriental*）、東印度公司檔案等，屢次記錄紡織品在亞洲海洋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香料交換的過程中，各地商人與海洋東南亞住民以織品作為主要的交換媒介，尤其是產自古吉拉特、孟加拉或科羅曼德海岸的絲綢與棉織品。這些貿易活動早期主要由阿拉伯和印度商人主導，之後逐漸轉為歐洲貿易公司所掌控。

印度紡織工匠善於根據不同市場的文化美學需求客製化產品，市場範圍涵蓋從歐洲、埃及、阿拉伯南部、海洋東南亞到日本等廣大區域。海洋東南亞偏愛的紡織品風格，自然與其他市場存在顯著差異。來自古吉拉特、孟加拉與科羅曼德海岸的織品，除了作為服飾或室內裝飾，甚至成為宗教儀式不可或缺的物品。值得注意的

是，英文中 Calico（最初指的是印花棉布）一詞，源自印度西南岸轉口港古里（Calicut）之名，見證了港口與印度棉織品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

在海洋東南亞，某些印度織品常由日常用途轉化為儀式功用，並啟發當地織品的圖案與紋樣的發展。印尼群島社群尤重兩類布料：一是印度西北部出產的絲質雙向伊卡「帕托拉」（*patola*，單數為 *patolu*）。「伊卡」（*ikat*）一詞源自印尼一馬來文，有「結」或「綁」的意思。是一種紡織品類型，也是極為複雜的染織技術。「雙向伊卡」（*double ikat*）必須分別對經紗與緯紗進行綁紮與染色，再交織成布，才能呈現精緻對稱的幾何圖案。由於染色的紗線在織造時難以完全精準對位，圖案邊緣常呈現輕微錯位或朦朧感，正是伊卡織品最具辨識度的特色。而印度西北部是世界上極少數能織造雙向伊卡的產地。「帕托拉」因價格高昂，亦出現棉質仿製品（圖 11），以木版印花染製成帕托拉紋樣，並深遠影響在地織品的設計。二是印度東南沿岸生產的繪染棉布，先以媒染或防染畫印紋樣，再進行染色，同屬高價貿易布料，廣受島嶼各族精英階層喜愛。⁴



圖 13-1 17 世紀至 18 世紀 印度西北部 印花棉布（儀式用掛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1463

院藏這件在古吉拉特織造的印花棉布（圖 12），邊框飾有經典幾何圖案，中心則繪有騎象出行人物、動物狩獵等水平排列的圖像，可能作為儀式中的懸掛物使用。其設計與當地著名的絲質帕托拉織品極為相似。帕托拉織品在印尼社會中具有神聖地位，常用於重要

儀式，因此這種模仿帕托拉風格的棉布深受印尼市場青睞。另一件長度約 4.5 公尺的印花棉布（圖 13），同樣來自古吉拉特。此類長布往往分為兩至三個區間，採用大膽幾何圖案與撞色設計。從現存文物來看，主要銷往蘇拉威西島中南部山地的托拉查（Toraja）社群。這個社



圖 13-2 展場一景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瑛攝





圖 14 18 世紀 印度東南岸 繪染布殘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織 000009

群常將渡海而來的印度織品視為傳家寶，用於各種重要儀式，體現了織品在當地社會中的珍貴地位。這也反映了布料透過具有國際聯繫的沿海聚落，經由複雜的貿易網絡輸送至島嶼內陸地區的流通模式。此外，同類產品亦有銷往摩鹿加群島南部巴巴群島（Babar archipelago）的紀錄。⁵此外，科羅曼德海岸出產的繪染布（圖 14），其上飾有水塘與松鶴紋樣，普遍認為受到日本風格影響。研究推測帶有這類紋飾的作品最初可能由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下簡稱 VOC）委託製作，以回應當時歐洲社會日益興起的中國風（chinoiserie）潮流，並藉此類圖樣作品試探荷蘭及日本市場的反應。⁶而從現存實例來看，這類布料的流通範圍或不僅限於此。部分作品可能

也銷往海洋東南亞地區，例如九州國立博物館所藏的一件相類作品（典藏號 1227），原出自蘇門答臘南榜，即為其例。⁷

印度織品在海洋東南亞的流通模式，展現了貿易網絡的幾個特徵：其一，是生產者根據消費市場的文化美學進行客製化設計；其二，是商品在流通過程中發生功能轉化（從日常用品到禮儀之物）；其三，是外來技術與圖案啟發在地工藝的發展。這種文化適應與創新的機制，同樣可見於其他類別的貿易商品。在本次展覽第二及第三個航程中將可見到更多的案例。

（二）銅器：百變的商品

此次展出的澎湖馬公海域出水的「短棹銅」（圖 15），為日本江戶時期大阪生產、長崎出口的標準化銅條，將在不同消費者手中，重塑成

不同造型與功能。自十七世紀中期起，銅取代白銀成為江戶時代的主要輸出品，可經由複雜的轉運網絡銷往印度、波斯等地，同時呈現不同中介商人的競合關係。是十七世紀後亞洲海洋貿易的重要見證。

銅條貿易網絡的運作仰賴多個轉運節點。主要透過 VOC 與中國商人銷往海外。VOC 將日本銅條運往印度、波斯等地，少量銷至暹羅與巴達維亞。臺灣大員港、馬六甲港都曾是重要的轉運站，澎湖亦曾作為貨船停泊與分銷的據點。明鄭時期（1662-1684）的商船同樣經營此類銅貨貿易，在臺灣、東京（越南北部）、暹羅等地轉售予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EIC），再輸往萬丹據點與南亞各地，充分展現了十七至十八世紀東亞與海洋東南亞之間緊密的貿易網絡。⁸

VOC 高級官員巴得薩·博特（Balthasar Bort, 1626-1684）於馬六甲任職期間著有《博特總督馬六甲報告書》（1678），內容揭示了應壟斷或轉銷的貨物，其中述及當時日本精煉銅條大

量經馬六甲轉銷印度之情形。報告指示超量的銅可部分運往巴達維亞存放，同時部分獲准賣給在亞洲區域貿易的葡萄牙人與摩爾人，銅條係以銀元（里爾）交易，而銀元正是購買馬來半島生產的錫礦的主要貨幣，⁹此次即有展出時代稍晚，1790 年作為當時國際貨幣的西班牙 8 里爾銀元。

（三）陶瓷：形制、紋飾與市場

陶瓷是東亞及大陸東南亞輸往海洋東南亞及歐洲的重要貿易品。陶瓷與織品相同，有特定產地、原料與技術的集中性，並針對市場提出客製化策略。

「軍持」（*kendi*）一詞源自馬來語，一般認為其詞源可追溯至梵文 *kundika*，意指注水器。軍持在海洋東南亞使用歷史久遠，為印度教、佛教與伊斯蘭教儀式中常見的器具。歷史上，中國、日本、越南乃至印尼本地窯場皆曾燒製各式軍持，以供東南亞市場需求。其基本造型多為細長直頸與盤口，便於持握。清水可自器口注入，再由另一側的壺嘴傾倒而出。而器身



圖 15 江戶時期（17 世紀中至 18 世紀中）日本 棹銅 2005 年 4 月澎湖馬公出水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藏 MGG-M-10-11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瑀攝

側邊伸出的管狀、引導液體流出的部位通常稱作「流」。軍持的「流」形制多樣，常見者有細長形與乳房形。十五至十六世紀間，越南窯窰曾大量生產乳房形流嘴的軍持（圖 16），並外銷至今日馬來西亞與印尼一帶。「新月」是伊斯蘭的重要象徵，院藏十六世紀景德鎮窯青花軍持（圖 17），器身呈優雅的新月形，據傳出水於印尼海域，可能是專門銷往東南亞伊斯蘭市場的產品。

此次展出的漳州窯五彩大盤（圖 18），其上以紅綠彩描繪九個圓圈並書寫阿拉伯文，這類設計一般亦認為是特別為伊斯蘭市場製作，在海洋東南亞留存不少相似的傳世作品。漳州窯位於福建漳州地區，於明末清初（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前期）盛極一時，其地生產的青花與五彩瓷大量外銷至東南亞、西亞、歐洲與日本。研究者指出，本件大盤可能為訂製品，在盤緣書寫的是《古蘭經》112 章〈忠誠章〉（Tawhid），內壁的八個小圓圈，文字兩兩重複，其中三組為阿拉伯文，一組為波斯文，

中心的圓圈則以波斯文書寫「謙卑的僕人與支持者汗一汗納，阿克巴汗王的追隨者」，即印度蒙兀兒王著名的阿克巴汗王（1542-1605）及詩人阿卜杜勒·拉希姆·汗一汗納（1556-1627），可能即為這件瓷盤的訂製者。¹⁰

此外，從歷代沉船出水，亦揭示了當時的商貿狀況與貨品樣貌。此次展出十四世紀越南〈鐵繪花卉碗〉，系與發現於馬來半島東南海域杜利安號沉船（Turiang shipwreck）相似品，而十六世紀前半的〈鐵繪花草紋蓋盒〉則出水於馬來半島東方海域的宣德號（圖 19）。還有分別來自年代約為十七世紀初期沉沒於登嘉樓外海的葡萄牙籍商船萬曆號（Wanli shipwreck）及一八四〇年代沉沒於柔佛外海的迪沙如號（Desaru shipwreck），此次即展出多件從中出水的青花瓷器。其中，卡拉克瓷（Kraak ware）是一種中國專為海外市場燒製的陶瓷，以器緣開光為主要裝飾特色，世界上許多產區亦跟進仿製。本次展出的〈青花開光花鳥大盤〉即為明代生產的典型（圖 20）。自十七世紀前半期起，



圖 16 黎初朝（15 世紀） 越南 靈藍釉軍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044



圖 17 明中期 景德鎮窯 青花新月形軍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105



圖 18 17 世紀 漳州窯 五彩阿拉伯文大盤 荷蘭公主堂陶瓷博物館藏 © Keramiekmuseum Princessehof, Leeuwarden GRV 1929-331



圖 20 明（17 世紀前半）青花開光花鳥大盤 萬曆號沈船出水 成陽藝術文化基金會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563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瑪攝 本作品為今年新進院藏，入藏後首次展出。



圖 19 a. 16 世紀中期 泰國 鐵繪花草紋蓋盒 宣德號沈船出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013
b. 14 世紀 越南 鐵繪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041 南院處提供 范芝瑪攝

這類瓷器透過東南亞各港口城市大量轉運至歐洲，並成為歐洲靜物畫中的常見題材。

（四）茶葉：十八世紀的貿易新主角

陶瓷作為耐久的器用，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物證。然而，貿易網絡中流通量更大的

是消耗性商品。茶葉的興起，標誌著十八世紀全球貿易結構的轉型——從奢侈品貿易轉向日常消費品的大宗貿易。

從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可窺見，中國自古大量出口的項目主要包含絲織品與陶瓷；到了



圖 21 清（19 世紀）關聯昌（廷呱）或其作坊 廣東 茶葉貿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畫 000098

十八世紀，隨著歐洲人的飲食需求，茶葉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商品。十八世紀前期，中國茶葉從廣州經位於爪哇島的巴達維亞（VOC 據點）轉口至歐洲，中國和葡萄牙商人曾是主要供貨者。隨著歐洲需求增加，各國商人紛紛加入。十八世紀後期之後，茶葉貿易逐步被英國人掌控，並長期獲取大量利潤。茶葉除了從海洋東南亞轉口往歐洲外，亦供給南洋在地華人移民的需求。

茶葉貿易與前述商品的流通模式有所差異。茶葉較易腐壞，對運輸速度與倉儲條件要求較高，因而催生了更快速的跨洋帆船。而當

茶葉的消費從菁英奢侈品轉向大眾日常飲品，貿易規模開始漸漸超過香料、織品或瓷器。又茶葉貿易與鴉片貿易形成複雜的對沖機制，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印度鴉片換取中國白銀，再以白銀購買茶葉運回歐洲，形成三角貿易。

院藏十九世紀〈茶葉貿易圖〉正呈現這段貿易背景（圖 21），此作出自廣州畫師廷呱（Tingqua，活躍於 1840-1870 年）或其作坊。外銷畫的尺幅規模罕見，畫面中心為挑高廳堂，上懸「承辦各種名茶」匾額，堂內工人忙於裝箱、包裝與登帳，人物姿態生動。畫家巧妙地將室外茶園到室內製茶與分裝等場景融合於同

一畫面，形成一氣呵成的敘事性構圖。這並非現實所見，而是刻意串聯以展現茶葉生產與貿易的樣貌。這類外銷畫不僅是藝術作品，也像是帶有異國風情的「貿易說明書」。其主要購買者為歐美商人與遊客，畫面刻意呈現完整的生產鏈，從茶園、採摘、烘焙到包裝與出口，滿足某種異國想像與好奇。

小結

從香料、印度織品、日本銅條、中國瓷器到廣州茶葉，展覽以多樣舶來品的流通軌跡與

片段故事，揭示海洋東南亞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關鍵地位。這片海域不僅連結遙遠地區的經濟活動，更串聯人們截然不同的感官經驗與生活想像。這些物質的流動提醒我們，貿易與文化交流從非單向的輸出或接受，而是一個多向、互動且持續變動的網絡。在海洋東南亞的歷史脈絡中，這種多層交流的複雜性尤為鮮明，展現了區域作為全球化早期舞台的獨特樣貌。¹¹

林宛萱、林容伊皆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1. 此次籌劃展覽的過程中，承蒙多位學者慷慨指導或協助，其中包含陳國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高嘉謙教授，謹此致以誠摯謝意。
2. 海洋東南亞之概念及相關歷史，展覽主要參照近年學界研究成果，例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著，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臺北：如果出版，2019）；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著，韓翔中譯，《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臺北：八旗文化，2022）；菲利普·鮑靈（Philip Bowring）著，馮奕達譯，《風之帝國：全球貿易的關鍵地帶，海洋亞洲的盛世繁華》（臺北：聯經，2021）；王賡武著，萬芷均譯，《陸海之間：東南亞與世界文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5）。
3. 地圖說明由鄭永昌研究員撰寫，筆者整理。
4. 有關帕托拉織品在海洋東南亞世界中的重要性，可參考相關研究成果。Robyn J. Maxwell, "Indian Trade Textiles: Sacred Heirlooms and Symbols of Rank," in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Periplus Editions; Tokyo: Tuttle, 2014), 206-216; Ruth Barnes, "Indian Textiles for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The Trade with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in *Clot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Art and Fashion of Indian Chintz*, ed. Sarah Fee (Toronto and New Haven: Royal Ontario Museum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73-81.
5. Ruth Barnes, "Indian Textiles for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75.
6. John Guy, "Palampore," in *Clot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Art and Fashion of Indian Chintz*, 183; Rosemary Crill, "A Revolution in the Bedroom: Chintz Interiors in the West," in *Clot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Art and Fashion of Indian Chintz*, 125, 127.
7. 九州國立博物館官網，「更紗：生命の花咲く布」企劃展中展出的〈茜地山水松鶴文様更紗儀礼用布〉https://www.kyuhaku.jp/exhibition/exhibition_pre158.html（檢索日期：2025年8月17日）。
8. 以上研究成果參照盧泰康，〈澎湖馬公港出水「棹銅」考〉，《南藝學報》，4期（2012.6），頁83-123。
9. Balthasar Bort, translated by M.J. Bremner,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1678,"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 no. 1 (99) (1927): 125-126.
10. Annabel Teh Gallop, "Ming ceramics for the Islamic market: Zhangzhou 'ninefold circle' plates with Arabic script,"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87 (2023): 73-84.
11. 本次展覽之執行團隊除筆者外，包含鄭永昌研究員協助地圖選件與說明、朱仕甄助理研究員與陳羿錡技術師負責運輸及保險事宜、黃耀增技正執行展示案。展覽整體設計得以圓滿，實仰賴美術設計李有欣女士與展覽助理范芝瑀女士的悉心協力。